

领略鄂尔多斯青铜文化

本报记者 邹雅婷



上图：战国圆雕立鹿饰件。

下图：战国错金虎符。

图片均由山西青铜博物馆提供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苍穹之下——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在山西青铜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由山西博物院、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鄂托克前旗文博研究院、内蒙古博物草原文化博物馆联合举办。400余件精美文物勾勒出一幅草原民族迁徙、战争、交往、融合的壮丽图景，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进程。

鄂尔多斯，地处黄河“几”字弯怀抱内，南过长城连中原腹地，北逾黄河越阴山，接蒙古高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在此碰撞交融。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因在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最具典型性而得名，以动物形装饰、小巧实用为显著特征，始自商代，盛于春秋战国，延续至汉，使用人群主要是以狄、匈奴为代表的畜牧-游牧部落。

展览分为“质朴奔放的青铜世界”“意趣天成的青铜艺术”“多元一体的文明传承”3个单元。

第一单元分门别类展示了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车马器等，代表性器物有双鹿首剑、鹤嘴斧、鹿首刀、马首匕、四马纹挂钩、青铜带具、双团豹纹泡饰等。草原民族彪悍尚武，用于近身格斗的短剑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管釜、鹤嘴斧多发现于中国北方地区，安装木柄后可用于砍砸、啄击。铜刀是牧民们屠宰、切割、加工皮料的好帮手。高圈足双耳青铜甗是游牧民族迁徙途中常用的炊具，方便拴挂携带。形式多样的马具，起到控制、保护和装饰马匹的作用。

第二单元主要表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艺术风格和制作技艺，代表性器物有虎衔羊纹饰牌、虎头咬斗纹金牌饰、刺猥咬蛇带钩、圆雕双山羊饰件、马纹镜石范等。草原上的能工巧匠从自然界中汲取灵感，刻画了逼真的动物形象和生猛的搏斗场景。鄂尔多斯先民不仅对双范合铸工艺驾轻就熟，对金银器的锤揲、模压、抽丝、焊接、镶嵌等复杂技术也运用自如。

第三单元重在探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演进中产生的深远影响，代表性器物有对鸟柄剑、蛇首匕、错金虎符、野猪纹青铜带钩、伫立马形青铜杖首等。佩剑是中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礼仪，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与早期草原男子随身携带短剑密不可分。牛、羊、马、兔、虎、蛇等草原动物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常见的元素，草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原地区十二生肖的形成。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虎形文物数量可观，虎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自古受到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共同崇拜。

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山西出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晋蒙同饮黄河水，文化联系十分密切，山西黄河沿线出土了不少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山西博物院藏铃首剑、虎首剑、三凸钮环首刀、蛇首匕、“白兵三奴”甗等文物，反映了山西地区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盛况。

开展当天，山西青铜博物馆举办“苍穹之下云之上”连麦直播，邀请鄂尔多斯市博物院专家为公众解读展览。线上数字展、各项教育活动也将于近期推出。



战国对鸟柄剑。

动漫原画特展在成都开幕

刘裕国

中国动漫诞生百年之际，“一支铅笔诞生的世界：动漫原画特展”在四川成都开幕。展览由成都博物馆与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合作组织，汇聚中国、美国、日本的248件经典动漫作品，展现各国动漫创作者互学互鉴、精益求精的艺术之路。

1922年，上海万氏兄弟制作了中国第一部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拉开了中国现代动画发展的序幕。百年来，中国动漫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产生了许多佳作。展厅里，一幅《大闹天宫》剧照吸引了观众的目光，三头六臂的哪吒脚踏风火轮、手拿乾坤圈，正与挥舞着金箍棒的孙悟空在九霄祥云间战斗。《大闹天宫》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长片，其精美的画面和瑰丽的色彩给当时的国人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

《黑猫警长》《葫芦兄弟》《宝莲灯》……这些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勾起了观众的童年美好记忆。《哪吒之魔童降世》《汉化日记》《熊猫潘戈》等当代优秀作品，展现了中国动漫产业的蓬勃活力。不少国漫作品蕴含中国文化元素，如《熊猫潘戈》主角形象为“国宝”大熊猫，《豪士歌》展现了四川的锦官城、剑门关等场景。

展览中可以看到来自迪士尼的大量原稿和珍藏赛璐珞作品，如世界上第一部动画长片《白雪公主》、享誉全球的《米奇与唐老鸭》；还有日本动漫代表作《铁臂阿童木》《名侦探柯南》《龙珠》等。

据悉，展览将持续到8月28日。

五千多件文物讲述考古奥秘

本报记者 张丹华

在众多考古爱好者的期盼中，陕西省历时10年精心筹建的陕西考古博物馆于4月底试开放。博物馆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南依秦岭，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设计。馆舍建筑为唐代风格、园林化设计，与秦岭生态区融为一体。作为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该馆将文物与出土背景结合，以考古的视角解读遗址，勾勒出中国考古和陕西考古的发展脉络，展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让公众走近考古、了解考古，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本报记者 张丹华



隋代苏统师墓出土的白瓷杯。

赵海晨摄

底部仰望壁画。”孙周勇说。

在此基础上，还融合数字多媒体技术，以3D投影方式演绎“堂中对坐图”“临行献酒壮行图”“醉归乐舞图”“停舆图”“放牧图”等墓主人一生的生活场景，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展品背后的文保科技和文化内涵。

寓教于乐 互动设施拉近观众距离

陕西考古博物馆在实现“可看、可听、可触摸、可互动”上下足功夫，着力提高展览的观赏性、知识性和趣味性。

在博物馆中，处处可见形式多样的互动装置。展区内设有多条引导提问，让观众带着问题去观赏文物，在观赏的过程中分析、思考并找出答案，达到通过展品与观众对话的效果。甲骨文连线、翻翻板、迷官图等小机关精巧有趣，拉近了观众与历史文化的距离。

梁家村芮国国君两位夫人墓中出土的组玉佩装饰精美华贵，引人注目。旁边的电子互动设备录入了“七璜联珠组玉佩”等文物的三维扫描数据，组玉佩由7件玉璜和728颗红玛瑙珠串联而成，出土时位于墓主人胸前。观众点击屏幕，帮助“夫人”搭配项饰、腕饰，可以直观地了解这些饰品的佩戴位置、使用功能和穿戴效果，感受芮国国君夫人的奢华生活。

适逢周末，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逛博物馆。赵先生带着妻子参观完后说，馆内展品很多，设施也很完善，寓教于乐，很适合孩子，“今天孩子玩翻翻板小道具玩得很开心，期待博物馆未来举办一些亲子活动。”（吴可莹参与采访）



石茆遗址立柱形石雕像。

赵海晨摄



蒲城县洞耳村元代壁画墓八边形穹顶。

来源：西安发布

亮点纷呈 90%以上文物首次展出

陕西考古博物馆室内展陈面积5800平方米，室外展陈区域1万平方米，涉及项目138个，共展出文物4218组5215件。

博物馆常设展览以“考古圣地 华章陕西”为主题，分为“考古历程”“文化谱系”“考古发现”“文保科技”4个篇章。临时展厅主要用于展示最新重大考古发现和专题研究成果。室外有田野考古主题展示区、历代砖雕展示区、陶瓷石刻文物展示区等。

“陕西考古博物馆5000多件文物珍品中有90%以上是首次与观众见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陕西考古博物馆馆长孙周勇说。

比如首经考古发掘出土的颜真卿书丹墓志“罗婉顺墓志”，被誉为“墓志界”艺术价值的“天花板”。颜真卿早期书法真迹仅见3例，罗婉顺墓志为其中之一，上面清楚刻有“长安县尉颜真卿书”。这合墓志结体笔触柔和，呈现出秀雅、飘逸的特征，使观众得以一窥颜真卿早期的书法风格，感受千年前的文字之美。

罗婉顺墓志旁边陈列着上官婉儿墓志。上官婉儿是武则天时期有“巾帼宰相”之名的内舍人。2013年在咸阳市渭城区发现一座斜坡墓道砖室土洞墓，出土墓志表明墓主为上官婉儿，补充了她在唐隆政变被杀后由太平公主为其礼葬的相关信息。从展板中的墓葬平面图可以看出，墓室被严重毁坏，可能是因为唐玄宗认定她是太平公主一党，进行毁墓。上官婉儿墓的考古领队李明曾表示，这块保存完好的唐代墓志记载了上官婉儿的世系、经历、死因、葬地等具体信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本身也是一件精妙的艺术品，值得细细观赏。

除了首次展出的文物外，馆内还有许多精品不容错过。刘家洼春秋芮国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小罐，罐内残留物为水、碳酸钙和动物油脂，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男性面霜类化妆品。渠树壕汉代砖室壁画墓墓室顶部的星象图，是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具有星形、星数、图像、题名四要素的二十八星宿图，图中有北斗七星、伏羲、女娲、牛郎织女等。隋代苏统师墓出土的一组白瓷器，包括白瓷四系罐、壶、盂、辟雍碗等，尤其是白瓷深腹杯，最薄处仅1毫米，是目前发现唯一完整的隋代透影白瓷器，显示了当时高超的制瓷技艺。

别出心裁 创新展陈带来视觉盛宴

不同于其他博物馆大多按时间顺序来展陈文

物，陕西考古博物馆围绕陕西考古的各个重点项目进行布展，重点展示杨官寨、芦山峁、石峁这几个都邑性遗址，介绍陕西境内丰富的秦、汉、唐都城、帝陵、贵族以及平民墓葬遗存。

“我们把一个墓葬或一个灰坑的出土文物陈列在一起。单件文物传递的信息是零碎的，但一组文物放在一起的时候，就能连缀成一条完整的信息，甚至能还原一段历史。”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荣说。

陕西考古博物馆在展陈上积极探索创新，运用诸多先进技术和新颖的展示形式，为观众奉上视觉盛宴。

石茆龙山时代遗址是距今4000年前后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都邑性城址，代表了中国北方早期国家文明的发展高度。为了展示气势恢宏的石茆城址，陕西考古博物馆用3D打印技术制作了城防设施、宫室建筑、大型墓地、手工业作坊遗迹的等比例缩小模型。一段护城石墙上，可以看到许多孔洞，内插圆木。这被称为“经木”，类似于现代建筑在混凝土结构中加入钢筋，起到维护建筑稳固的作用。过去认为经木的运用最早始于汉代，石茆经木的发现，将技术的应用实例提早了1000多年。由于经木在墙壁中水平放置，暴露在墙体外的部分还可利用石雕进行装饰，石雕内容有兽面纹、龙纹、人面纹、虎纹等，异常精美。

“我们看到石茆的立柱形石雕像，它是双面神的面部，纵目、阔嘴、长须。像这样的石雕艺术品，在中国早期的考古发现中非常少见。”孙周勇介绍。

在“文保科技”篇展出的蒲城县洞耳村元代壁画墓，反映了科技创新对文物保护的影响。这是一座八边形穹窿顶砖室墓，墓室壁画色彩丰富、保存完整，体现了蒙元时期精湛的壁画艺术。墓室北壁绘制着墓主夫妇“堂中并坐图”，西壁是“献酒壮行图”，东壁是“醉归乐舞图”，南壁环绕甬道口绘有对飞双雁和曲卷草。墓顶穹窿形格分绘4幅“童子戏花图”和4幅“火焰珠图”，交叉间隔。甬道东壁绘“停舆图”，西壁绘“放牧图”。

“壁画的地位与砖体结合紧密，用常规的揭取方法很难保障画面的完整性，考古人员创新性地采用更换支撑体的方式，对壁画墓进行整体搬迁。布展时将壁画墓抬升至3米高处，观众可从



潼关棣村隋代皇室壁画墓的陶俑组合。

本报记者 张丹华摄

